

早闻狄声

《熟年》的宋丹丹，挺好

《熟年》原本是我不敢看的那种电视剧。单看庞大家庭的设定,就知道那必然有一地鸡毛的故事。婆媳矛盾、中年危机、职场困扰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恩义纠葛,越是真实,越是看得人心生烦恼。然而,冲着郝蕾、宋丹丹等主演,多少还是好奇:有好演员在,即便构不成佳篇,至少会有佳句。

果然,宋丹丹扮演的倪家大嫂吴二琥最先出圈。明明人设是不太讨喜的市侩妇女,她愣是演出了让人好气、好笑又忍不住心疼的气质,连弹幕里都是观众盼着她出场的呼声。说起来,宋丹丹的演技有点“薛定谔”:稳定发挥时足够惊喜,自我放飞时则显然有些“咋咋呼呼”。好在这回的《熟年》,宋丹丹明显收敛了爱耍嘴皮子、沉溺台词的习惯,选择用更沉稳的表现还原出吴二琥的多重身份。

在丈夫倪伟民(张国强饰)面前,吴二琥是共过苦却没享过福的勤俭妻子,想得开又会来事儿,有种只要够努力生活还能再上一层楼的乐观。在妯娌和叔嫂面前,她是算计着为小家庭多争取资源的精明大嫂,哪怕难免贪小便宜,依然看得出本心不坏,甚至还有些朴素的仗义。当倪家二哥倪伟强(刘奕君饰)抱怨妻子张春梅(郝蕾饰)对自己太过控制时,吴二琥给出了一番激烈反驳,字字句句,是老百姓说得出口、有共鸣的大白话。

吴二琥与儿子儿媳的戏份,则是家庭剧里最常见的“恶婆婆”桥段。从看不上外地媳妇,到花式催着儿媳生孩子,再到翻脸不认自己买房的承诺,桩桩件件都叫人窒息。然而宋丹丹将背后的逻辑线索梳理得清清楚楚:吴二琥原本就是一个眼界

钱眼识人

有多少爱可以重回

随着暑期档的临近,总的来说院线呈现出很开放的态势,最显著的标志性动作就是与北美同步上映的好莱坞大片越来越多,作为普通观众的我几乎第一时间把《蜘蛛侠:纵横宇宙》、《闪电侠》等都刷完了,关于特效、笑点以及故事解读的部分就不多说了,最深刻的感受是这两个“侠”在创意上几乎是面对面撞题,超级英雄发誓要拯救家人,弥补来不及说爱你的亲密关系,它们都借用了“多元宇宙”的概念把本已疲软的IP刺激得支棱起来,似乎又可以再活跃几年了。

实际上,“多元宇宙”可以说是好莱坞目前最偷懒的套路,并且大力在全球院线上推广,躺平着把钱赚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作品把这个套路的效力发挥到极致,也打了样板。一个就是漫威自己的《蜘蛛侠:英雄无归》,它最大的贡献就是将这个IP以往作品中的反派角色,历任蜘蛛侠扮演者用一个宇宙的概念塞进了一部电影的片长里,实现对粉丝最大面积的煽情和诱惑,就像在一年上头的春晚把喜闻乐见大大小小的明星用“回家”的概念攒在了一起,至于逻辑是否合理是否自洽就暂时降为次席了,很可能这样的做法在成本上也是聪明的,用性价比最高的片酬请来最多的明星,并且让所有人共襄盛举,都沾沾流量和话题的光。新上映的《闪电侠》本来是漫威的竞争对手,但也把这个套路如法炮制的,它不但让“正义联盟”的所有成员露脸了,也让数位扮演超人的、蝙蝠侠的演员也请来宠粉,记得在我看的那场里,当尼古拉斯凯奇、乔治克鲁尼出现时竟然有人鼓掌起来。

而另一部对于“多元宇宙”套路有重大贡献的当属奥斯卡

情人看剑

故事的疗愈之力

动画电影《天空之城》的音乐本月在国内影院响起时,的确让人有故人重来之感。其实该片1992年就在中国上映过,这三十多年间,也以各样形式出没于日常生活,音乐会上、赛璐璐原画手稿展上,都可见其身影。引进片就有这点好处,不太受时间新旧限制,随时可以“杀入”影市。

在和平、反战、环保等主题之下,宫崎骏借一段少年的冒险之旅,叩问人类文明应该怎样使用科技。无论是在电影诞生之时,还是科技浪潮奔涌的眼下,这样的讨论都不过时,尤其此刻,人类已经站在要不要和AI共生的路口:人脑植入芯片指日可待,人脑甚至还可以扩展为“超级智能”;反对者认为,这等于归附于自己造出来的“神”,其疯狂程度不啻于造一座通天塔与上帝平起平坐。

风暴才刚刚开始,这样的忧心忡忡,可以在宫崎骏作品里时常可见。科技的双刃剑,让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也可能开启潘多拉魔盒。如同卡辛斯基在他的反科技宣言《工业社会及其未来》里说的,“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

不高、保守庸俗的小市民,再加上家庭经济差,她眼睛里就只有柴米油盐、传宗接代之类的事。我们大概无法认同她的所作所为,然而她的付出、无奈、挣扎,也是真的。

郝蕾的表演亦有让人难忘的之处。她扮演的张春梅或许是最容易让观众感同身受的:人到中年,你或许已经习惯掌控一切,但当人生的走向注定不可控,怎么办?

在张春梅的故事线里,她是如此自律、如此尽心,却依然逃不过生活浪潮的击打:一边是丈夫突然精神崩溃想要离婚寻找自我、婆婆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急需照顾;一边是职场危机四伏,苦苦等待的升职机会倏然远去……郝蕾演活了那种努力留住生活主动权的矛盾,而张春梅完美背后的不完美,也从另一个层面为观众提供了自我观照的空间。尽善尽美的体面、事无巨细的操心,何尝不是另一种画地为牢?人到熟龄的感悟,或许就在于强大并不意味着承担一切、控制一切;放过自己、放下执念,也是另一种成熟。

遗憾的是,除了这些出色的表演,《熟年》中还是有太多不必要的累赘枝蔓。这背后的原因,是所谓“关系户”注水加戏也好,是主创团队缺乏自信什么元素都想要也罢,最终只是让人感叹——成就佳句不难,造就佳篇才真是千载难逢的运气。

拿奖大户《瞬息全宇宙》,如果说《英雄无归》在商言商,是从投入产出比去发挥创意作为工具的效能。而这部由华裔女星主演的动作喜剧片则在价值观层面让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了“多元宇宙”的存在,并且将其植入在情感深处,当杨紫琼举起小金人的时候,不少网友就很有默契地点评,原来我们在她是影后的那个宇宙里。这是电影中一个非常浪漫的梗,杨紫琼在片中饰演杨紫琼,一个征服西方的影后。多元宇宙在这些电影中,是为了让孤独的人们获得救赎而存在的,它是一种生命价值的守恒,当你在这个宇宙里是失意的,但你在某一个宇宙就一定是志得意满的,而你现在真实感受的失意,也被赋予了一种超越的、有牺牲精神的英雄情怀,因为你让更多的“自己”可以享受自由的冒险。在我的理解里,这种感觉很像是一把佛家里的前世今生关系从纵向摆成了横向的平面,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运转。

其实,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确实没有必要去思考它是否符合科学规律,“多元宇宙”的套路正如两部电影所示,一个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加明星加卖点,而另一个则有明确的文艺情怀,拯救灵魂,弥补生活。最近上映的两部好莱坞大片,无论是《蜘蛛侠》还是《闪电侠》可能兼而有之,多一些明星人物(形象)去完成一个规定动作,穿越宇宙去渡人渡己。问题是,如果多元宇宙是存在的,你要救的人救得完吗?有多少爱可以重回呢?

机器控制,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宫崎骏可能没料想到的是,大数据和算法,已经以摧枯拉朽之势去中心化,草根的崛起、低俗的狂欢,成为硬币的一体两面;机器背后,无论程序员还是用户,都可能成为整个系统的燃料与祭品。

不过,故事里有没有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可以给我们提供安慰、启示和希望,就像今年高考作文里有一道题说的,“故事是有力量的”。类似例子,今年三月国内上映的新海诚动画《铃芽之旅》,也是用故事疗愈人心的作品。新海诚在社交媒体上说,创作源于日本大地震给国民带来的迷茫,“不知道日常生活何时会崩坏”,他由此产生强烈的内疚感:作为一个娱乐电影创作者,应该担任怎样的职责?

在《铃芽之旅》中,地震被具象化为“蚓厄”,时时笼罩在城市上空,如同天罗地网。铃芽之旅,也是走出灾难心理创伤阴影之旅,如片中的咒语所说,“我深知命如蜉蝣,深知死亡总是如影随形,但此时哪怕再多一年、再多一日、再多一时也好,我辈仍愿人生得续。”重返灾难现场,目的不是往伤口上撒盐,或所谓“消费苦难”,而是通过传达希望、勇气和成长等主题元素,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安慰和启发,在寻找和重建家园与自我的过程中,用这样的故事达到疗愈的目的,重新获得前行的力量——新海诚所说创作者的职责,正在此。

花言峭语

风口从来不是永久

凭借短视频和直播,柯以敏又重新成为焦点人物,她推出唱歌课程,她在直播间和付费的粉丝一对一对阵,与此同时,她早年担任“超级女声”评委的片段,以及她在唱歌前表示自己“这首歌(《默》)我比那英唱得更好”的场面又被网友挖了出来,乐评人丁太升则在自己的视频节目里嘲笑她,大批网友在短视频里模仿她唱歌。

柯以敏第一次走红,是在一九九零年代。在华语流行乐的黄金时代,她凭借《太傻》等几张专辑,在流行乐坛有了自己的地位。那时的唱片业,善于对人进行全方位的包装,扬长避短,给歌手铸造出一种歌艺和心性都非常完美的形象,她也因此在很长时间内,维持了一个“唱将”的形象。直到2005年,她成为“超级女声”的评委。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选秀节目的成就之一,是把评委(导师)工作变成了一项崭新的事业,柯以敏、黑楠、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被导师工作重塑形象之后,刘晓庆、黎明、徐静蕾、英达、唐国强、韦唯,陆续出现在各种评委席上,田震和毛阿敏在选秀节目里同台演唱,《中国最强音》邀请章子怡担任导师。明星分成两个阵营,当过评委的,没有当过评委的。

评委作为一个电视节目的固定角色,蒙尘许多年。早年的比赛(或者选秀)里,评委的存在感很淡,1984年开始的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评委像芭蕾舞里的背景人物,只在歌手演唱结束的时候,才会以举牌亮分的形式,说明自己的在场,核分算名次的时候,他们接受主持人采访,表达他们对歌手的殷切希望。评委、选手、比赛所演示出的真实和虚幻的关系,远没有后来这样复杂。他们唱、评分,我们听,并且接受,即便有意见,也绝没可能抵达他们那里。如此这般,相安无事十几年来。

电话和网络的出现,让观众觉醒了,评说的权力被提上议事日程。1998年的第八届青歌赛,增设了团体比赛和综合素质考核,选手在流光溢彩地唱完歌之后,得部分地露出真身,出一点常识上的洋相。2000年的第九届青歌赛,增设“评审组”和“第二现场”,观众的意见手臂,开始延伸到了现场。一旦选手表演和评委评分有争议,观众就打电话和发短信表示不满。

“超女”、“快男”出现在网络普及之后,制作方显然意识到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身世来历都有瑕疵的姑娘小伙子,以及他们那良莠不齐的歌唱水平,很可能吸引来排山倒海的评论,面对这种可能,他们组建了以成名艺人为主的评委团队,用毒舌、刻薄话,让评论功能在现场就得以实现。当场自骂、自嘲,要比事后被骂被嘲,更能占尽先机,评委于是成了假想敌,观众转而同情选手,基本忽略了他们的歌唱水平。

评委承担起了让评论转向的任务,分流了袭向节目的压力,他们的毒舌语录,以及他们的做法是否经过提前设计的争论,都顺理成章地成了节目的一部分,并造就了节目的记忆点,柯以敏当众建议选手应该刮刮腋毛,建议选手应该去为恐怖片配音,还有那句著名的“滚吧”,还有杨二车娜姆头上的大红花,和她的言论——要和选手骑马,并打算把选手“种在后花园”,还说“我是仙女,整天在天上飞的,人间的东西影响不了我”。

选秀比赛,它们拥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戏剧结构,导师、学员、媒体、观众之间的关系,因此空前复杂。导师除了负责评判,负责表演(做出听到天籁的表情),负责将情感区域扩大之外,功能还延伸到了场外,要指导编曲和演唱,要带领学员巡回演出。他们介入节目的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综合体之前,他们的形象、权威,都得到了极大的重塑,“评委”因此成为最吸引明星的工作。

但很快,选秀节目没落了,平台和节目赋予评委的能量逐渐衰竭了,风口掉落,柯以敏回到了歌手的位置,她性格上的瑕疵,没有了评委光环的保护,显得异常明显。她曾抛掷给别人的尖刻、势利,现在都被抛掷了回来。

柯以敏在名利场的跌宕,可以看做一场更大的真人秀,在这场真人秀里,所有人都是棋子,所有人都不会是赢家。那种叫做“势”的奇妙东西,在每个人身上流转,谁也别妄想逃过它。